

为何“高学低就”：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

邵剑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高学低就”现象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重要且紧迫的现实问题。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发现,教育失配现象在不同群体中均有发生,但总体上各类群体表现出教育适度特征,过度教育更易发生于传统优势群体中,而教育不足更易发生于传统弱势群体中;个人层面的学历水平和认知能力以及地区层面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过度教育的主要因素;各因素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个人层面的因素对传统的弱势群体的积极影响更大,而地区层面的经济因素则对传统的优势群体的积极影响更大。有鉴于此,应关注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稳步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向纵深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强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加快地区经济对外开放水平。

[关键词] 过度教育 教育错配 “教育—工作”匹配 影响因素 学习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 G62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4)06-0127-10

伴随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者占比不断提升,在对社会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高学低就”现象显现,并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重要且紧迫的现实问题。研究者们对“高学低就”的持续性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持有垫脚石假说(the stepping stone hypothesis)的研究者们认为,“教育—工作”错配是暂时性的,可能具有一定的战略性,毕业生通过暂时接受失配的工作以积累经验,为后续内部晋升或寻求更好职业做准备;持有陷阱假说(the trap hypothesis)的研究者们认为,“教育—工作”错配具有长期性的负面影响,潜在的雇主会将求职者之前的失配现象视为个体能力或技能低下的标志,这将给劳动者

的职业生涯留下疤痕^[1]。但无论是一种垫脚石还是一种陷阱,不可否认的是,过度教育对就业市场造成了重大挑战^[2]。在此背景下,探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教育现象,考察其背后的原因,对创造“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结构性因素与过度教育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过度教育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劳动力市场上因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加而导致的“大学毕业生被雇佣到低于其实际教育

收稿日期: 2024-03-18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地方高校评价价值研究”(2024FG014)

作者简介: 邵剑耀,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公平研究。

水平的工作岗位,且教育回报率较之前有所下降”的社会现象^[3]。也就是说,过度教育与教育扩招存在关联,正如部分文献所指出的,“过度教育伴随着过去半个世纪内全球性的教育扩张而出现”^[4]。

20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先后实施教育扩招政策,国民受教育机会因而大幅增长^[5],以种族或民族、家庭背景等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教育扩张背景下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研究者们基于自身学科背景结合社会现实纷纷提出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例如再生产理论(Reproduction Theory)、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文凭主义假设(Credentialism Hypothesis)、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等,这些理论各有其侧重点,但均指出优势群体在教育扩张中获益最多,即因教育扩招带来的新增教育机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会优先被优势群体如男性群体(相对于女性群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群体(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群体)、家庭资本较高群体(相对于家庭资本较低群体)、社会地位较高群体(相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群体)等掌握。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过度教育确实发生,更可能出现在聚集了较多教育资源的优势群体中。尽管就业过程中存在歧视现象,例如,因雇主的性别刻板印象,对于女性来说,找到一份匹配良好的工作可能更具有挑战性,也存在“自愿放弃”现象,例如,因家庭责任(如低资本家庭子女往往提早承担起照料父母等职责),求职者可能会自愿回避那些对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有妨碍的岗位,^[6]但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影响,弱势群体整体上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过度教育更可能以个例或“小部分样本”的形式存在于弱势群体中。

假设1:相比于弱势群体(包括家庭背景较差的群体),优势群体(包括家庭背景较好的群体)更可能发生过度教育。

(二)个人能力、经济环境与过度教育

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是解释“教育—工作”匹配的经典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水平是劳动者人力资本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学校教育通过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等方式帮助个体积累人力资本,并由此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7]简言之,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就业质量呈正相关关系。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不断推进。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The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公布的数据可知,1970年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总数为3339.86万人,1990年达到6779.94万人,21世纪初突破1亿人,2013年突破2亿人,2022年更是达到2.54亿人。^[8]截至2020年,世界范围内已有76个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9]由此可见,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岗位的“敲门砖”,且正在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大量实证研究指出,受教育年限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存在积极影响^[10],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显著提升了居民上大学的概率以及取得大学文凭的概率,这些好的教育结果进一步转化为了更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即居民平均就业概率以及全年、全职工作概率均有所提升,对于个人而言,接受更高的教育(如拥有大学本专科学历)成为其稳定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11]

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年限越高并不意味着个体的综合实力就越强。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伴随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是求知之士的学习场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大学不再只为才华横溢和享有特权的人保留”,这是一件好事,但大学学位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被“掏空”,统计数据表明,大学生平均智商从1939年的119分下降到了2022年的102分,略高于人群平均智商(100分),也就是说,“学生不再是非凡的,而只是普通人”,雇主不能再依赖“拥有大学学位的申请人比没有大学学位的申请人更有能力或更聪明”的观念选择

员工。^[1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过度教育背后隐含的可能是个人能力不足问题,即一些劳动者的实际受教育年限可能超出了其职业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但从总的人力资本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工作资格可能不会过高。^[13]

假设2:个人能力越强,越能够找到与其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越不可能发生过度教育。

然而,人力资本理论并非完美。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理论验证了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等同于证实了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性功能”。^[14]人力资本理论对创造就业、消除贫困和缓解不平等问题解释更多体现在个体特征上(个人能力不足),忽视了社会大系统的结构性因素。^[15]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指出,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内的子系统,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互融通,教育受经济、政治、文化制约,但同时又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16]过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教育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尤其是经济子系统(对教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因素)配合失衡所造成的结果,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造成了教育的过量,^[17]使得短期内劳动力市场中没有足够多且适当的工作岗位来容纳各级各类教育毕业生。通俗地讲,在经济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过度教育发生的概率更高,因为“劳动者更关注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者在失去工作时能寻找到新岗位,而不太关注(“教育—工作”)匹配质量”。^[18]就我国社会而言,导致过度教育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配置的低效率,而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是消除过度教育现象、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必然选择。^[19]

假设3:个体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就越低。

考虑到过度教育中存在着群体差异性,个人能力和经济环境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势必在不同群体中表现出不同。一般而言,居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家庭以及资源拥有量较高的家庭往往更注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且家庭生活常

以子女制度化的校内外活动为中心,通过协作培养传输包括语言技能在内的差别优势。^[20]另外,这些优势家庭较擅长利用自身资本获取“额外”信息,以帮助其子女获得所处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学历文凭,以维持其现有社会地位。^[21]因此,个人能力的提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优势群体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但对于家庭资本缺乏的弱势群体而言,可能会产生极强的正面效果。

假设4:个人能力和经济环境对过度教育的影响更易作用于弱势群体中。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最新公布的两期数据,即CGSS2018年和2021年微观调查数据。根据研究需要,研究者对CGSS数据进行筛选。本研究将已毕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年龄在18至60岁期间的有职业代码信息和最高学历信息的样本。由于部分职业与学历的相关程度并不大,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删除了就业类型为雇主、个体工商户、家庭企业就业、自由职业者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就业类型样本^[22]。经过筛选,在剔除基本信息及主要变量缺失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为4012。

(二) 变量设置

首先是因变量的设置。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过度教育。目前学界通常采用三种方式测量职业中的教育过度情况。第一种是工作分析法,亦可称客观匹配法,即根据职业评估专家评定而形成的包括任职资格(每个职业所需的受教育水平)等“标准”在内的职业信息评估手册,结合劳动者实际受教育情况进行判断;第二种是自我评估法,亦可称主观匹配法,即劳动者自我评估是否处于过度教育状态或通过询问目前劳动者从事职业所需的受教育水平和其实际的受教育水平进行对比判断;第三种是经验统计

法,亦可称实际匹配法,即基于某一职业内部从业人员实际受教育水平的均值、标准差或众数等统计指标进行判断。^[22]鉴于CGSS2018年以及2021年数据未提供自我评估法所需的信息,本研究采用经验统计法测量过度教育。参照韦尔多戈(Verdugo)等人的研究^[23],将劳动者实际受教育年限高于其所从事职业的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均值的一个标准差视为过度教育,其余则视为非过度教育,其中,低于其所从事职业的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均值的一个标准差可视为教育不足。某一职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基于职业分类(ISCO-08)二位编码计算。若二位编码样本量少于10,则不进行计算,相应样本该变量被视为缺失作剔除处理。

其次是自变量的设置。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三部分,即个体特征、个人能力和经济环境。个体特征包括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和家庭背景,前者被具体化为性别、地区、居住地(城乡)、户籍、民族五个变量,均设置成二分类变量,分别以女性、非东部地区、乡村、农业户口、少数民族为参照;后者被具体化为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两个变量,分别以样本对当前自身家庭经济水平的主观评分以及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分为依据。个人能力被具体化为学历水平、政治面貌和认知能力三个变量。学历水平根据样本当前最高受教育程度衡量,分为高中及以下学历组和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组;政治面貌以样本当前党员身份衡量,划分为非党员组和党员组;认知能力主要指样本当前的语言能力,基于问卷中关于样本普通话和英语的听、说能力的四个题项得分,取总分进行衡量。经济环境被具体化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对外经济和经济创新五个变量,各变量所涉及的数据均为相应调查年份省域层面的数据(自行匹配,非CGSS调查数据)。经济规模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为元)衡量;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占比(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经济效益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单位为元)衡量;对外经济以

出口依存度(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货物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衡量;经济创新则以创新企业相对规模(每10万人口平均有R&D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数)衡量。

再次是控制变量的设置。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其他个人基本信息、工作特征以及调查年份三部分。其他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婚姻状况以及年龄、年龄的平方等变量,前者设置成二分类变量,以无配偶或同居伴侣为参照。工作特征包括单位性质、工作机会以及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等变量,单位性质设置成二分类变量,以非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为参照;工作机会以相应调查年份省域层面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行匹配,非CGSS调查数据)衡量,城镇登记失业率越高说明工作机会越少;工作经验指实际工作年限,借鉴已有研究的处理方式^[23],通过“劳动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入学年龄(本文设定为6岁)”计算获得,对于若干得分呈负数的样本(入学年龄可能在6岁以前)则取0年。调查年份即指数数据来源年份,根据样本源自CGSS2018年或CGSS2021年设置成二分类变量。各变量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说明

变量	描述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过度教育	二分类变量: 0=过度, 1=非过度	0.876	0.329	
性别	二分类变量: 0=女, 1=男	0.536	0.499	
人口	地区	二分类变量: 0=非东部地区, 1=东部地区	0.555	0.497
学特征	居住地	二分类变量: 0=乡村, 1=城市	0.859	0.348
	户籍	二分类变量: 0=农业户口, 1=非农业户口	0.601	0.490
	民族	二分类变量: 0=少数民族, 1=汉族	0.954	0.209
家庭背景	家庭经济状况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1, 5]	2.716	0.683
	社会地位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1, 5]	2.413	0.796
个人能力	学历水平	二分类变量: 0=高中及以下, 1=大学专科及以上	0.467	0.499
	政治面貌	二分类变量: 0=非党员, 1=党员	0.162	0.368
	认知能力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4, 20]	11.883	2.929
经济环境	经济规模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31336, 183980]	90030.590	39238.742
	经济结构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0.427, 0.817]	0.563	0.116
	经济效益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13798, 43640]	26118.617	9522.185
	对外经济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0.008, 0.481]	0.171	0.141
	经济创新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0.010, 0.400]	0.101	0.091
其他个人基本信息	婚姻状况	二分类变量: 0=无配偶或同居伴侣; 1=有配偶或同居伴侣	0.768	0.422
	年龄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18, 60]	39.101	10.299
	年龄的平方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324, 3600]	1634.909	826.959

(续表)

变量	描述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单位性质	二分类变量: 0=非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 1=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	0.219	0.414
工作机会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0.140, 0.430]	0.030	0.007
工作经验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0, 48]	20.393	11.858
工作经验的平方	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0, 2304]	556.476	524.229
调查年份	二分类变量: 0=2018年, 1=2021年	0.362	0.481

三、研究结果

(一) 不同个体特征群体的教育失配率

教育失配现象在不同群体中均有发生,但总体上各类群体表现出教育适度特征。基于性别维度考察,男性群体中过度教育的样本占比较大,比女性群体高出5.14个百分点,女性群体中教育适度的样本占比较大,高于男性群体2.17个百分点,女性群体中教育不足的样本占比亦较大,高于男性群体2.97个百分点;基于地区维度考察,东部地区群体中过度教育的样本占比较大,比非东部地区群体高出6.03个百分点,非东部地区群体中教育适度和教育不足的样本占比均较东部地区群体高,分别高出2.22和3.81个百分点;基于居住地维度考察,城市群体中过度教育和教育适度的样本占比均较乡村群体高,分别高出7.59和3.19个百分点,但城市群体中教育不足的样本占比较乡村群体低,低了10.78个百分点;基于户籍维度考察,非农业户口中过度教育和教育适度的样本占比均较高,分别高于农业户口群体8.80和2.83个百分点,农业户口中教育不足的样本占比较高,高于非农业户口群体11.63个百分点;基于民族维度考察,汉族群体中教育适度的样本占比较高,高于少数民族群体7.21个百分点,少数民族群体中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样本占比均较高,分别高于汉族群体3.56和3.65个百分点(见表2)。

表2 不同个体特征群体的教育错配率

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变量		过度教育		非过度教育	
		适度	不足	适度	不足
性别	男	14.75%	72.17%	13.08%	
	女	9.61%	74.34%	16.05%	
地区	东部地区	15.05%	72.19%	12.76%	
	非东部地区	9.02%	74.41%	16.57%	
居住地	城市	13.43%	73.63%	12.94%	
	乡村	5.84%	70.44%	23.72%	
户籍	非农业户口	15.87%	74.31%	9.82%	
	农业户口	7.07%	71.48%	21.45%	

(续表)

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变量		过度教育		非过度教育	
		适度	不足	适度	不足
民族	汉族	12.20%	73.51%	14.29%	
	少数民族	15.76%	66.30%	17.94%	

表3呈现了过度教育和非过度教育群体的家庭背景相应变量的得分情况。与非过度教育群体相比,过度教育群体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得分均值均较高,且标准差均较小,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反而更高。在非过度教育群体中,教育适度群体在两个变量上的均值均高于教育不足群体,且前者的标准差更低,说明在非过度教育群体中,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较少发生教育不足现象。综上,假设1得到部分证实。

表3 不同家庭背景群体的教育错配情况

变量	家庭经济状况		社会地位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过度教育	总	2.776	0.678	2.492	0.776
	适度	2.708	0.683	2.402	0.798
非过度教育	总	2.730	0.680	2.412	0.788
	适度	2.597	0.687	2.350	0.846

(二) 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

基于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本研究考察了各类自变量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并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结果。表4中的模型1仅纳入了控制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可以发现,仅性别变量和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显著,男性群体非过度教育的概率低于女性群体,个体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其非过度教育的概率越高。模型2和模型3分别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能力和经济环境变量。据模型2可知,在纳入个人能力变量后,与模型1相比,各个体特征变量的显著性及回归系数的方向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个人能力变量中,学历水平和认知能力变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接受过高等教育以及认知能力较高的群体其非过度教育的概率更高。据模型3可知,在纳入经济环境变量后,与模型1相比,各个体特征变量的显著性及回归系数的方向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经济环境变量中,仅对外经济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4纳入了控制变量和所有自变量。据模

型4可知,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变量和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显著,男性群体非过度教育的概率仅为女性群体的0.493 ($e^{-0.707}$) 倍,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每上升一个单位,个体非过度教育的概率便会增加0.188 ($e^{0.172}-1$) 倍;个人能力变量中,学历水平和认知能力变量显著,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水平的群体非过度教育的概率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水平的群体的3.854 ($e^{1.349}$) 倍,个体认知能力每上升一个单位,其非过度教育的概率便会增加0.094 ($e^{0.090}-1$) 倍;经济环境变量中,经济效益和对外经济变量均显著,但前者的回归系数为0,影响极小,而后者的回归系数为正,后一个变量每上升一个单位,个体非过度教育的概率便会增加3.306 ($e^{1.460}-1$) 倍。

综上,假设2和假设3得到部分证实。

表4 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	-0.757*** (0.120)	-0.701*** (0.123)	-0.762*** (0.120)	-0.707*** (0.124)
地区	0.120 (0.134)	0.042 (0.138)	-0.187 (0.255)	-0.217 (0.254)
居住地	0.317 (0.237)	0.273 (0.236)	0.290 (0.238)	0.244 (0.237)
户籍	0.227 (0.152)	0.165 (0.153)	0.227 (0.153)	0.172 (0.155)
民族	0.381 (0.258)	0.419 (0.259)	0.349 (0.259)	0.383 (0.261)
家庭经济状况	0.209* (0.098)	0.182+ (0.099)	0.204* (0.098)	0.172+ (0.100)
社会地位	0.113 (0.088)	0.102 (0.090)	0.122 (0.089)	0.113 (0.090)
学历水平		1.339*** (0.359)		1.349*** (0.359)
政治面貌		0.124 (0.148)		0.136 (0.149)
认知能力		0.088** (0.027)		0.090** (0.028)
经济规模			0.000 (0.000)	0.000 (0.000)
经济结构			1.706 (2.055)	2.104 (2.080)
经济效益			0.000 (0.000)	0.000+ (0.000)
对外经济			1.426+ (0.779)	1.460+ (0.788)
经济创新			-0.166 (1.266)	0.044 (1.277)
-2似然对数值	1975.553	1953.420	1971.329	1948.705
N	4012	4012	4012	4012

注: +P<0.1, *P<0.05, **P<0.01, ***P<0.001, 上述各模型中均纳入了控制变量。下表相同。

(三) 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群体异质性

为了考察各自变量对过度教育的影响是否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显示出异质性,在表4模型4的基础上,本研究依次纳入了个体特征变量与各类自变量的交互项,结果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表中仅呈现了交互项显著的分析结果。模型4-1和模型4-2呈现的是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性别异质性分析结果。据模型4-1可知,“性别×学历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学历水平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学历水平对女性群体非过度教育的正向影响比对男性群体更大;据模型4-2可知,“性别×经济结构”的回归系数为正,经济结构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地区经济结构对非过度教育的正向影响更易作用于男性群体。模型4-3呈现的是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民族异质性分析结果。据此模型可知,“民族×学历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学历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学历水平对非过度教育的正向影响在少数民族群体中更大。模型4-4至模型4-7呈现的是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居住地异质性分析结果。据模型4-4、模型4-5可知,“居住地×学历水平”“居住地×政治面貌”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而学历水平、政治面貌变量在相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学历水平、政治面貌对居住于乡村地区的群体非过度教育的正向影响比对居住于城市地区的群体更大;据模型4-6和模型4-7可知,“居住地×对外经济”和“居住地×经济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对外经济和经济创新在相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对非过度教育的正向影响更易作用于城市群体。

表5 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性别、民族及居住地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模型4-4	模型4-5	模型4-6	模型4-7
性别	0.243 (0.376)	-2.250*** (0.573)	-0.707*** (0.124)	-0.699*** (0.124)	-0.712*** (0.124)	-0.709*** (0.124)	-0.711*** (0.124)
地区	-0.215 (0.254)	-0.220 (0.255)	-0.217 (0.255)	-0.161 (0.253)	-0.202 (0.256)	-0.197 (0.255)	-0.222 (0.255)
居住地	0.263 (0.238)	0.246 (0.238)	0.246 (0.237)	1.240** (0.391)	0.399 (0.248)	-0.266 (0.375)	-0.295 (0.364)
户籍	0.179 (0.155)	0.182 (0.155)	0.176 (0.155)	0.167 (0.155)	0.182 (0.155)	0.184 (0.154)	0.186 (0.154)
民族	0.386 (0.261)	0.403 (0.261)	1.374* (0.576)	0.393 (0.260)	0.385 (0.261)	0.405 (0.261)	0.399 (0.261)

(续表)

变量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模型4-4	模型4-5	模型4-6	模型4-7
学历水平	2.040*** (0.425)	1.299*** (0.359)	2.406*** (0.669)	2.424*** (0.494)	1.318*** (0.359)	1.358*** (0.360)	1.366*** (0.360)
政治面貌	0.139 (0.149)	0.141 (0.149)	0.144 (0.149)	0.149 (0.149)	1.340+ (0.753)	0.137 (0.149)	0.139 (0.149)
认知能力	0.089** (0.028)	0.086** (0.028)	0.088** (0.028)	0.092*** (0.028)	0.089** (0.028)	0.089** (0.028)	0.089** (0.028)
家庭经济状况	0.179+ (0.100)	0.175+ (0.099)	0.180+ (0.100)	0.182+ (0.100)	0.170+ (0.100)	0.173+ (0.100)	0.170+ (0.100)
社会地位	0.108 (0.090)	0.121 (0.090)	0.106 (0.090)	0.107 (0.090)	0.115 (0.090)	0.116 (0.090)	0.118 (0.090)
经济规模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经济结构	2.188 (2.086)	0.466 (2.175)	2.190 (2.080)	1.924 (2.086)	2.278 (2.086)	2.301 (2.080)	2.246 (2.078)
经济效益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外经济	1.447+ (0.791)	1.423+ (0.791)	1.481+ (0.790)	1.425+ (0.789)	1.448+ (0.790)	-1.783 (1.921)	1.366+ (0.790)
经济创新	0.117 (1.282)	0.076 (1.287)	0.056 (1.276)	-0.175 (1.278)	0.131 (1.279)	0.571 (1.315)	-3.102 (1.954)
性别×学历水平	-1.048** (0.397)						
性别×经济结构		2.593** (0.936)					
民族×学历水平			-1.163+ (0.641)				
居住地×学历水平				-1.419** (0.471)			
居住地×政治面貌					-1.264+ (0.764)		
居住地×对外经济						3.201+ (1.724)	
居住地×经济创新							3.832* (1.835)
-2似然对数值	1942.157	1941.035	1945.876	1939.858	1945.297	1945.362	1944.495
N	4012	4012	4012	4012	4012	4012	4012

模型4-8至模型4-10呈现的是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户籍异质性分析结果。据模型4-8和模型4-9可知，“户籍×学历水平”和“户籍×政治面貌”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学历水平和政治面貌在相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学历水平、政治身份(党员)对农业户口群体非过度教育的正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群体更大；据模型4-10可知，“户籍×经济结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经济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经济结构对非过度教育的正向影响在农业户口群体中更大。模型4-11至模型4-14呈现的是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社会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据这些模型可知，“社会地位×学历水平”“社会地位×政治面貌”“社会地位×认知能力”和“社会地位×经济结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学历水平、政治面貌、认知能力、经

济结构变量在相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上述变量对社会地位较低群体的正向影响更大。

综上，假设4得到部分证实。

表6 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户籍及社会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4-8	模型4-9	模型4-10	模型4-11	模型4-12	模型4-13	模型4-14
性别	-0.704*** (0.124)	-0.707*** (0.124)	-0.717*** (0.124)	-0.709*** (0.124)	-0.704*** (0.124)	-0.711*** (0.124)	-0.726*** (0.124)
地区	-0.198 (0.254)	-0.213 (0.255)	-0.212 (0.254)	-0.221 (0.255)	-0.238 (0.238)	-0.241 (0.254)	-0.213 (0.254)
居住地	0.199 (0.238)	0.261 (0.238)	0.188 (0.239)	0.232 (0.237)	0.252 (0.238)	0.225 (0.238)	0.238 (0.238)
户籍	0.811* (0.391)	0.272+ (0.164)	1.507* (0.726)	0.173 (0.155)	0.161 (0.155)	0.168 (0.155)	0.166 (0.155)
民族	0.387 (0.261)	0.381 (0.262)	0.386 (0.260)	0.370 (0.260)	0.370 (0.262)	0.409 (0.260)	0.377 (0.263)
学历水平	1.681*** (0.393)	1.324*** (0.359)	1.312*** (0.360)	0.170+ (0.099)	0.178+ (0.100)	0.175+ (0.099)	0.176+ (0.100)
政治面貌	0.142 (0.149)	0.717+ (0.375)	0.131 (0.149)	0.501* (0.246)	0.190+ (0.099)	1.011** (0.364)	1.187** (0.369)
认知能力	0.091*** (0.028)	0.089** (0.028)	0.093*** (0.028)	2.262*** (0.627)	1.313*** (0.359)	1.258*** (0.361)	1.297*** (0.359)
家庭经济状况	0.177+ (0.100)	0.173+ (0.100)	0.169+ (0.100)	0.136 (0.149)	0.991* (0.491)	0.142 (0.149)	0.144 (0.149)
社会地位	0.113 (0.090)	0.114 (0.090)	0.112 (0.090)	0.091** (0.028)	0.091** (0.028)	0.260*** (0.073)	0.089** (0.028)
经济规模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经济结构	2.031 (2.083)	2.258 (2.084)	3.751+ (2.263)	2.048 (2.076)	2.066 (2.084)	2.207 (2.079)	6.304* (2.508)
经济效益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外经济	1.432+ (0.788)	1.490+ (0.791)	1.384+ (0.790)	1.450+ (0.788)	1.544+ (0.791)	1.541+ (0.792)	1.421+ (0.789)
经济创新	-0.018 (1.275)	0.056 (1.275)	-0.100 (1.278)	0.017 (1.276)	-0.045 (1.281)	-0.009 (1.278)	-0.168 (1.281)
户籍×学历水平	-0.736+ (0.412)						
户籍×政治面貌		-0.692+ (0.402)					
户籍×经济结构			-2.384+ (1.277)				
社会地位×学历水平				-0.433+ (0.254)			
社会地位×政治面貌					-0.332+ (0.180)		
社会地位×认知能力						-0.069* (0.027)	
社会地位×经济结构							-1.838** (0.612)
-2似然对数值	1945.435	1945.555	1945.024	1945.721	1945.264	1942.276	1939.566
N	4012	4012	4012	4012	4012	4012	4012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首先，不同群体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育失配现象。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多发生于传统

的优势群体如男性、东部地区、城市、非农业户口群体中,虽然女性、非东部地区、乡村、农业户口群体中非过度教育的样本占比较高,但其中的教育不足现象较相对应的优势群体更为常见。家庭背景上亦存在群体差异,即家庭背景较好的群体更易发生过度教育。但当综合考虑个人能力和经济环境因素时,家庭经济状况能有效缓解过度教育发生率。值得注意的是,过度教育现象在不同民族群体中的表现与上述情况并不一致,传统的优势群体即汉族群体较传统的弱势群体即少数民族群体的教育适配率更高,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群体的教育失配情况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概率均较高。

其次,个人层面的学历水平和认知能力以及地区层面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过度教育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以语言听、说水平为代表的认知能力可以有效降低过度教育现象的发生,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能有效缓解个体的过度教育率。

再次,各因素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具体而言,学历水平和政治身份的正向影响更易作用于农业户口、乡村地区以及低社会地位群体,前者还更易作用于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地区经济结构的正向影响更易作用于男性、农业户口以及低社会地位群体;认知能力的正向影响更易作用于低社会地位群体;而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创新的正向影响则更易作用于城市地区群体。由此可见,个人层面的因素对传统的弱势群体的积极影响更大,而地区层面的经济因素则对传统的优势群体的积极影响更大。

(二) 对策建议

其一,关注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稳步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向纵深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向纵深发展,应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仅要关注其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困境,更要关注其高质量的大学前教育

机会获得问题,以使其达到接受高等教育应当具备的知识基础。^[24]同时,树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重视高等教育本身的形式结构、层次结构、学科结构和布局结构问题^[25],通过建立多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其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劳动者“高学低就”的背后隐藏的是学历与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劳动者若要适应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及时更新知识储备^[26]。在全社会树立起终身学习风气;加强对终身学习教育各类资源的统筹,建立开放共享的公共学习资源服务体系;灵活运用新技术,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建设立体化、多元性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终身教育平台。

其三,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应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建立健全就业服务制度:一是借助数字化技术搭建公益性的就业服务平台,加强与劳务输出地的合作交流,及时发布岗位招聘等信息,并通过对个人的实名制认证和对企业的多数据核查等确保招聘求职过程的安全可信度,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的有效对接提供“一站式”精准服务;二是要加大人力资源信息库建设,通过行政与市场结合手段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围绕求职者的需求和岗位的要求依托信息库数据资料实现精准匹配,开展对求职者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未就业人员“一对一”求职帮扶;三是做好监督监管工作,通过官方媒体做好就业宣传,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消除企业招聘过程中的“第一学历”歧视等现象,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参考文献:

- [1]CECILIA A, DAVIA M A, LEGAZPE N. Educational mismatch in recent university graduates. The role of labour mobility[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23, 26(1): 113-135.
- [2]WICAKSONO P, THERESIA I, AI AUFA B. Education-occupation mismatch and its wage penalties:

-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Cogent Business & Management*, 2023, 10(3): 2251-206.
- [3]李根丽. 过度教育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22: 19.
- [4]吴晓刚, 李晓光.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匹配的变迁趋势——基于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的动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2): 102-122, 206-207.
- [5]邵剑耀. 高校扩招中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城乡差异及其内部性别分化[J]. *深圳社会科学*, 2023(6): 101-111.
- [6]SHIN D H, BILLS D. Trends in educational and skill mismatch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 (2021-10-15)[2024-03-12]. <https://www.mdpi.com/2076-0760/10/10/395>.
- [7]张顺, 李诗扬.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 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77-92.
- [8]The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Enrolment in tertiary education, all programmes, both sexes (number)[EB/OL]. (2024-03-11)[2024-03-11]. <http://data.uis.unesco.org/index.aspx?queryid=3811#>.
- [9]邵剑耀, 别敦荣. 普及化阶段省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与推进路径——基于存量与增量关系视角的实证分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8): 85-95.
- [10]刘涛, 王德政. 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J]. *人口研究*, 2021(4): 85-99.
- [11]文桥. 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与高等教育回报——基于中国高校扩招的准实验方法[J].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22(2): 184-207.
- [12]POMEROY Ross. Undergraduates' average IQ has fallen 17 points since 1939. Here's why[EB/OL]. (2024-01-22)[2024-03-11]. <https://bigthink.com/thinking/iq-score-average-college-students/>.
- [13]ROBST J. Career mobility, Job match, and over-education[J].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95, 21(4): 539-550.
- [14]王蓉. 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与突破——“新人力资本理论”十年之后再反思[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0(1): 42-58, 189.
- [15]KLEES S. Human capital and rates of return: brilliant ideas or ideological dead end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16, 60(4): 644-672.
- [16]潘懋元. 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J]. *上海高教研究*, 1997(2): 3-9.
- [17]何斌. 过度教育现象分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4(12): 8-10.
- [18]BORGNA C, SOLGA H, PROTSCH P. Overeducation, labour market dynamics, and economic downturn in Europe[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 35(1): 116-132.
- [19]张晓蓓, 开朋. 我国过度教育现象研究——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10(17): 31-36.
- [20]屈廖健, 邵剑耀, 傅添. 谁在高校扩招中获益最多?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 *高校教育管理*, 2021(3): 70-82.
- [21]BUCHMANN C, HANNUM E.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27(1): 77-102.
- [22]尤亮, 李根丽. 过度教育与劳动者离职倾向[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3(12): 80-95.
- [23]VERDUGO R, VERDUGO N T. The impact of surplus schooling on earnings: some additional finding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89, 24(4): 629-643.
- [24]别敦荣, 邵剑耀. 普及化高等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11): 25-32.
- [25]潘懋元, 肖海涛.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结构与体系变革[J]. *高等教育研究*, 2008(5): 26-31.
- [26]别敦荣.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必须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J]. *终身教育研究*, 2020(2): 4-7.

【责任编辑 史敏】

Why “High Education and Low Employment”: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vereducation

SHAO Jianyao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High education and low employ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practical problem in the current labor market.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t is foun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education mismatch occurs in different groups. But in general, all group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ate education. Overeducation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d groups, while under-education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the traditional

disadvantaged groups. Individual educational level and cognitive ability as well as regional exter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over-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over-education presents heterogeneity due to differe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factors on the traditional disadvantaged groups is greater, whil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d groups is greater. Thu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steadily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develop in depth. Besides, we should build a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oriented society. What's mor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are also important. Last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accelerate the opening up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Keywords: over-education; educational mismatch; “education-work” matching; influencing factor; learning society

(上接第116页)

[38]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33.

[39]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26.

[40]彭希哲, 胡湛.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3): 121-128, 222-223.

[41]郭春镇.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进路[J]. 法学研究, 2023, 45(1): 20-37.

[42]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张雁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154.

[43]阿克顿. 权力与自由[M]. 侯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42.

[44]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7-02(002).

【责任编辑 袁竑源】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of CPC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the Party from 2012 to 2022

CHEN Dunkun

Abstract: Aft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has mad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 the inner-party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the CPC from 2012 to 2022. The Party with strong quality is the main line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e organizational scale of the Party is more moderate, the structure of Party members is more balanced, an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advanced nature of Party members are stronger. It present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faces challenges like weakened leadership, aging, and hidden issues. It should prioritiz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lying on a robust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Keywords: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ner-Party statistical bulletin; self-revolution; strong quality of the Party;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